

周礼

远古的理想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冯绍霆 著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周礼

远古的理想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冯绍霆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礼:远古的理想/冯绍霆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7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ISBN 978 - 7 - 5325 - 4958 - 0

I. 周... II. 冯... III. ①礼仪—中国—周代②官制—中国—周代③周礼—通俗读物 IV. K224.06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568 号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周 礼

远古的理想

冯绍霆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20 印张 10.2 插页 3 字数 157,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4958—0

B · 626 定价: 19.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

事一经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一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提起乌托邦，提起太阳城，提起这一类西方人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东方人并不陌生。那么，我们东方自己呢？生活在亚洲东部、拥有绵延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有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充满想象力、饱含着对美好生活激情的作品呢？这些作品是不是也像西方同类作品那样广为流传，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呢？

答案毋庸置疑：有。《周礼》就是一部。只要稍具文史常识，就知道《周礼》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与《仪礼》、《礼记》并称三礼，且为三礼之首。它所阐发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需要注意的是，《周礼》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并不等于说那完全是作者的空想。实际上，《周礼》中还包含了若干周代的史料。既有史实的成分，又有理想的成分，两相掺杂，固然使这部书留下了更多的疑团，但同时也使这部书生发出更明亮的光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话提醒我们，周代的制度是儒家心目中的典范，名之以“周”的礼仪将会成为后世的楷模。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环绕着《周礼》的神圣光环是难以消除的。

翻开《周礼》，可以发现，全书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几乎每篇都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起首。以下，在《天官》则说“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先总述天官一系自大宰以下六十二种职官的名称、职级、属员数额等编制情况，再分叙各种官职的职掌范围。如大宰就为六卿之首，百官之长，天下政务由他掌理，以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地官》的体例与之相同，在“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

安扰邦国”数语之后，同样先总述地官司徒以下七十九种职官的编制情况，再分叙各官职掌。《春官》、《夏官》、《秋官》各篇都是如此，五篇中一共说明了五大系列三百四十余种官职的情况。这些官职除个别的，如《地官》中的司禄、《夏官》中的军司马、舆司马等十数条阙失外，其余的讲得都很具体。他们的执掌范围，上至国家的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祭祀等重要事务，下至地方行政，甚至包括了直接管理平民百姓生产生活的，可以说，《周礼》以大量的篇幅，通过官制介绍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情况。这个社会由各式各样的制度控制着人的行动，显得很有秩序，各人的负担也很均衡，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和谐的气氛。

《冬官》一篇，情况有些特殊，它实际是一篇《考工记》。《考工记》不以“惟王建国”数语开首，开宗明义即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说明主要讲述百工之事，所记内容为先秦时期官营手工业中的三十个工种，即“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的概要情况，包括各工种的工艺技术要求和产品质量的检验方法。由于手工业生产不光是一个加工制造的问题，它还要涉及原料的选择、产品的设计思想等等，所以《冬官》的内容必然会涉及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有人讲，这一部分内容可以看成先秦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状况的一个总结，这当然不是过誉之词。

读者可能会问，这样两种差异很明显的材料，怎么会出现在同一本书里呢？这需要从《周礼》被发现的经过说起。

《周礼》名曰“周”，实际上在西汉以前并不为人所知。先秦诸子议论周代礼制的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人明确提到过有这么一部书。直到西汉初惠帝时废除秦代的挟书律，又鼓励献书，一些为免遭焚毁而藏诸山崖屋壁的先秦古文旧书这才开始露面。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献王曾得到过李氏所献的一批古文书，其中就包括《周礼》，当时还称为《周官》。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薨于武帝元光五年，此书初次露面当在这二十余年。这时，已缺《冬官》一篇，献王以重金悬赏，终不可得。之后，这部《周官》被收入皇家秘阁，重又度其不为人知的岁月。百年时光流逝，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皇家藏书，直到此时，它才再度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次，刘歆即以《考工记》补足已经亡佚的《冬官》，凑满了《周官》六篇的数量。他这样做，似乎也有道理。按《周官》本身而言，其中如《天官》篇大宰、小宰诸条所载，亡

佚的《冬官》篇包含着有关百工之事的内容，讲手工业工艺的《考工记》显然与之有联系。从思想上说，《周官》全书浸透了阴阳五行思想，而《考工记》同样如此。内容相关连，思想又一致，刘歆所为或许事出有因。甚至有人推测，《考工记》原本是为写作《冬官》而作的一篇礼记。果真如此，则以《考工记》补《冬官》更顺理成章了。只是，从体例上看，两者的差异太明显了。

刘歆整理了《周官》，现在所见的，大致就是这个本子。他还奏请将它列之于经，并定名为《周礼》。可以说，没有刘歆，就没有今天所知道的《周礼》。然而，诸多纠葛也由此而起。其中最令人关心的是《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

尽管《周礼》本身没有提到它论述的是何朝何代的典章制度，更没有“周公若曰”之类言辞，但是刘歆却认定，它是“周公之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学生杜子春设席授业，传《周礼》之学，一时歆学大盛，众多鸿儒竞相为《周礼》作解诂。至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博采众家之说，作《周礼注》，认为《周礼》就是周公为周成王所制官政之法。由于郑玄在经学界的声望，《周礼》为周公手作之说为后世学者所宗。然而这个结论实在漏洞太多，《周礼》中所述制度与西周政制不相吻合的不胜枚举。周初封国，无有过百里的，而《周礼》中却称“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令人吃惊。因此到了历史科学发达的今天，周公作《周礼》之说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周礼》作者的另一个极端的说法是刘歆伪造说。此说始倡于宋人，代表人物为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宏认为，刘歆伪造《周礼》是为了“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周礼》是古文经，在群经中出现最晚，又无传授，发现经过也人言人殊，尤其是刘歆在其间所起作用，并非丝毫无可怀疑。今文学家认为此书来历不明，不能说完全是宗派之见。然而，汉初民间所献之书不是绝无仅有的少数几部，秦火劫余，要一一指明其端绪，事实上也难以办到。仅凭此一条，断言为刘歆伪作，多少感觉牵强。更何况，这场争论中除了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外，还夹杂着政治斗争的背景。胡氏父子力主刘歆伪造，目的之一就是反对王安石援引《周礼》作变法的依据。学术问题，又加上政治问题，不纠缠成乱麻一团，才是咄咄怪事。

除了以上两说，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周礼》成书年代

的各自看法。有的认为《周礼》所述什九是西周旧制，当是东迁以后作者得见西周王室档案，故讲古制极为纤悉具体，但其中也增入了作者自己的设想。有的则认为从《周礼》所显示的伦理思想、政治制度等方面分析，此书当作于西周末的厉王、宣王、幽王时代。也有的学者从全书的思想体系着手，认为它的主体思想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复合而成，呈现“多元一体”的特点，故而《周礼》当成书于汉初高祖、文帝之际。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战国说。自东汉经师何休提出《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的观点以后，历代都有人景从其说。至近代，此说赞同者越来越多。清儒崔述《丰镐考信录》、皮锡瑞《经学通论》，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周官著作年代考》、郭沫若先生《周官质疑》、顾颉刚先生《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范文澜先生《经学讲演录》等等，均持此说。然而，学术上的争论，向来不依赞同者的多寡为是非的标准。关于《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的探讨，必定还会长久持续下去，直至得到一个满意的结论为止。

那么，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耗费如许精力孜孜以求呢？为的是《周礼》太富于研究价值了。

概而言之，《周礼》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它包含了周代的史料。以后世人的眼光，可能难以理解《周礼》所述的官职系列中何以会有专管饮食、衣服之类琐事的。殊不知，这恰恰是当时真实情况的记载。身处当今之世而欲考求古代中国的实况，诸如古代的田制、兵制、学制、刑法、祀典诸大端，《周礼》是可以提供给人们许多帮助的。

再有就是它对后世的影响。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大事件，而这两件事，恰恰都规摹了《周礼》。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曾经席卷大半中国，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所制订的《天朝田亩制度》被誉为中国农民的理想最集中的体现。而这部《天朝田亩制度》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又正是《周礼》。甚至在今天，当我们漫步北京城，站在天安门前观赏景色时，东边可以看到曾经是太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边有设有社稷坛的中山公园，又有谁会想到，这种宫殿居中、左边祖庙、右边社稷的格局，正是《周礼》的规定。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读一读《周礼》是大有益处的。

问题在于怎么读。

《周礼》文繁事富，许多词汇语法现代人难以理解。上文提到过地官司徒“佐王安扰邦国”一语，一般人都会把“扰”字同乱字连在

一起，作扰乱解。而在这里，“扰”字偏偏与“安”字同义，含有使人驯顺的意思。一部《周礼》，此类情况不少，欲破此关，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最基本的三种：一、郑玄《周礼注》，二、贾公彦《周礼注疏》，三、孙诒让《周礼正义》。郑玄的注实际上为《周礼》学作了第一次总结，简奥融通，功力最深，为学习研究《周礼》必读之书。贾公彦疏成于唐初，它是阐释郑注的，实际上已经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包括在内，故而是《周礼》学的第二次总结。孙诒让正义成于清末。他根据宋元明清历代学者的研究，疏通证明，折衷最为恰当，在清人新疏当中没有超过此书的。在目前，也可以说孙氏正义是《周礼》学的最后一次总结。如能将这三种基本参考材料理清，则《周礼》也就基本上掌握住了。

在读这些注疏时，它们的体例是必须了解的。宋代以前，注和疏是分别印行的，至宋代才把注疏合刻成一部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周礼注疏》流传很广，研读者经常使用。书中大字都是《周礼》正文，大字下面双行夹排的小字是郑玄的注。接着又有一个大字〔疏〕，则表明以下为贾公彦的疏。这些疏文以小圆圈相间隔，小圆圈前都有“某某至某某”数字，如果它们指的是大字中的文字，则圆圈后的疏文是解释正文的；如果它们指的是小字中的文字，则疏文是对郑玄注的说明。

《周礼正义》的内容排列次序是：《周礼》正文，郑玄注，一个大字“疏”，对正文的疏，空一格，“注云”，以下为对注文的疏。也就是说，“正义”同贾公彦疏一样，不但要解释正文，而且要给前人的注作注解。理不清这个头绪，这一类注疏是很难读通的。

读注疏书时还应当注意注释术语的用法。下面将郑玄《周礼注》中常用的一些术语简介如下，其余注家的可以以此类推。

（一）单纯解释词义的：

某，某也。或者作：某者、某也；某，某；某者，某；某，言某也。这些注释的基本格式，意思是某一词应当解释为另一词。

谓之、曰、为。约略等于现在经常说的“叫作”，被解释的词往往放在这些术语之后，说明词则在前。

犹。约略与现代汉语的“等于说”相当，用来表示释者与被释者为同义或近义关系。

谓。使用“谓”字时，被释的词语在前面，“谓”字后面是解释。

貌。含有“……的样子”之意。

（二）与读音有关的：

之言、之为言。它们都是声训术语，解释者与被解释者或者是同音，或者是双声、叠韵等某种语音上的联系，一般用以解释词源。

读为、读曰。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的。

读如、读若。一般用于注音，所谓“比拟其音”，有时也用本字来说明伪借字。

（三）指明误字或版本异同的：

当为。指出因形或声相近而发生的字、声之误。

书、故书。它们都指的是不同的版本。

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借助了上述几种基本参考材料，并参阅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草成的。篇幅有限，也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本小册子难以把整部《周礼》作全面、详尽的介绍，只能选择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若干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这些问题分成五个类别：第一类是《周礼》作者有关理想社会总体框架的构想，以下四类分别是《周礼》作者有关如何管理政府机构和官吏、如何治理百姓、如何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设想，以及主要是体现在《考工记》中的一些科学思想，或者说科学思想的萌芽。按所涉及问题的不同，每一类中还分成若干小节，各节都由《周礼》原文、今译和述评三部分组成。《周礼》原文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周礼注疏》转录。个别文字同其他版本有出入，又比较紧要者，疑为衍字、误字者，均加注说明。为了方便阅读，笔者试对原文作了标点，主要依据的是黄侃先生对《周礼》的句读，以及林尹、闻人军诸先生的著述。如有错讹，当由笔者负责。《周礼》中不乏关于同一问题的论述散见各篇的例证，为了述评方便，将散见各处的原文纳于同一节中，所以一节之中可能包含两段以上的原文。今译，笔者力求忠实于原文，尽可能直译。为了使读者能理解《周礼》作者时代的一些特殊语汇，理解《周礼》作者的一些设想，译文中糅合郑玄、贾公彦等所作的注疏，作了些说明。这样做，大概还是必要的。述评，当然要叙述《周礼》作者表达了什么想法，更希望指明，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对于今天的我们又可能有甚么样的启迪。

写作时，金良年先生提供了许多意见和资料，对于这本小册子的完成极有帮助，在此深表谢忱。

笔者学力未逮，疏漏之处必多。高明有所指正，则不胜感激。

目 录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前 言 / 3

第一章 理想国的总蓝图 / 1

一、王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 3

二、突出王地位的都城规划 / 6

三、以大宰为首的职官体系 / 12

四、规定行政区划，实行分级控制 / 19

五、王是千里王畿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 25

六、规整均平的井田制度 / 29

第二章 严密的国家管理体制 / 37

一、处理政务的基本原则 / 39

二、以“法”作准绳强化管理 / 44

三、对官员实行严格的考核 / 47

四、政府机构的分工协作与相互制约 / 55

五、以德才为标准选拔官吏 / 61

六、对档案的高度重视 / 66

第三章 精心设计的治民模式 / 75

一、以得民聚民为目标的治民纲要 / 77

二、遍布全国的教育网 / 82

三、亦兵亦农的严密社会组织 / 86

四、刑罚是一种威慑力量 / 94

五、刑罚居于辅助地位 / 97

六、定案讲究准确性 / 101

七、反对不教而诛 / 107

八、处罚人是为了挽救人 / 115

九、用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 / 121

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富国政策 / 123

一、完备细密的国家财政管理 / 125

二、强调节约 / 136

三、以增加生产来增加收入 / 140

四、重视农业生产与平均负担 / 145

五、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 / 148

六、市场的设立和管理 / 154

七、国家参与市场的经济活动 / 165

八、交通管理 / 169

第五章 科学管理思想的发端 / 171

一、系统论思想的萌芽 / 173

二、以最优化设计追求最佳效果 / 177

三、建立量度标准和工艺规程 / 183

四、讲究产品质量 /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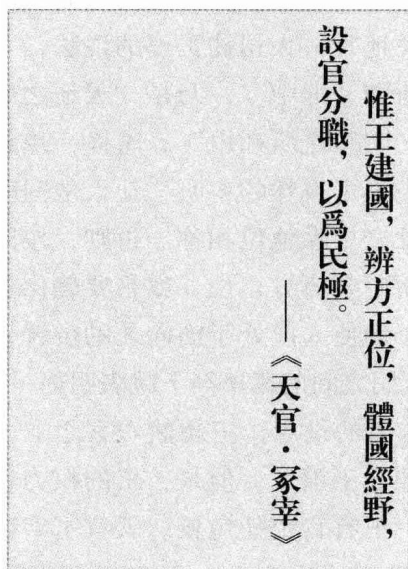
篇目索引 / 192

第一章

理想国的总蓝图

人 建造房屋，蜜蜂构筑蜂房，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在造房之前要设计出一个蓝图，按图施工，而蜜蜂却是一种本能的行为。为了生活得更舒适一些，人们想方设法在构想蓝图时就作了种种改进，让房屋建造得尽可能完美些。对生活于其中的小环境如此，对生活于其中的大环境——社会又怎样呢？历史上，许多哲人抨击他们所处的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社会，渴望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于是，在他们笔下出现了一幅又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周礼》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幅充满东方情调的蓝图。王高踞整个社会的顶端。他生活在位于整个国家中心的王城中央的王宫里，统治着国家。在他之下，是以天官冢宰为首的百官，辅佐王管理社会，协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官员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系统。天官冢宰上佐王治，下领百官，是王的主要助手和百官首领，他所率领的百官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管理层，为王执行各种政务。据研究，这些百官的设置又同战国时开始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不无关系。王直接统治方千里的王畿。同时，他也是这片土地上占地最多的人，他的儿子兄弟，他的公卿大夫也在王畿中占有大小不等的土地。王畿之外，则是各诸侯封国，像众星拱月一般护卫着王畿。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古代中国在农业生产中曾经实行过的井田制，经过《周礼》作者的剪裁增补，形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方案，成为理想社会中把劳动力固着在土地上的主要手段。按照《周礼》作者的设想，井田制下的农民，按照劳动力的强弱多少，领受一定量的土地，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耕作，他们所需付出的代价是负担赋税和徭役。这样的负担大体上是均平的，又不重，看来农民应该满足。以上诸端，是《周礼》作者所想象的理想社会的基本框架，也是本章所谈的主要内容。

王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原文〕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天官·冢宰》

〔今译〕

王建立国家，首先要辨别东南西北的四方，勘定王所居宫室的位置；以此为中心划分王所在城市的土地，营建宗庙、社稷、朝廷、市集、道路，并度量郊野的土地进行分封，实行井田制度；设置各种官员，执掌各自的职守，辅佐王治理民众，使民众不脱离中直正确的范围。

〔述评〕

这是《周礼》第一篇《天官》的开首第一句话。以后的《地官》直至《秋官》各篇，同样以它开宗明义，可见作者强调的程度。它应是《周礼》的总纲，王在理想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在此被规定下来，理想社会中的一切都由此生发展开。

任何国家都包含了国土和人民两个要素。《周礼》作者认为，这两者的中心都系于王一身。普天下的民众数量众多，由王设官，让官员们治理民众，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都要对王负责。王、官员、民众三个层次，一层控制一层。王居于中心地位，而分封的诸侯国，布列在王畿四周，拱卫着王所居的王城。这里特别要注意“辨方正位”四个字。它不是单纯识别东南西北的方向，随便找一块地方作为王宫的位置。按照《地官·大司徒》里的说法，“辨方正位”的关键在于取“地中”。所谓“地中”，乃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这样一块无与伦比的宝地。王占据“地中”，即占据了自然的中心，让天地四时环列王的周围。如此，才可以和王的社稷主宰地位相称。再则，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君为阳，臣为阴。之所以要辨方正位，就是要确保君王处于面向南的位置，以体现君为阳，而使人臣处于面向北的位置，恰好处于阴。这样一来，君阳臣阴，他们之间的尊卑高下就表明得一清二楚。

按照《周礼》作者的设想，王超然六官之上，驾馭六官治国，所以用不着专述王权的《王篇》。但是，王的权力还是可以从《周礼》中了解一个大概的。王有官吏任免权。天官冢宰以下各官，都由王所立，官员的薪俸、赏赐均出自王。王有制订法律的权力。《周礼》多处提到要公布法令，又讲要听王命，不听王命和不守法的同样要受惩罚。可见王言出即法，制订法律的权在王。治朝权，即处理国家日常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它也属于王。王视朝时，百官中地位最高的大宰只能在旁赞佐，以下更不用说了。司法终裁权也操之于王。六乡狱讼尽管罪名已定，即将刑杀，但杀与不杀，最终还要听王的裁决。较六乡偏远的六遂等处，则由王派人去裁决。可见终裁权在王手里。宗法社会中，祭祀神明、祖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周礼》中，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这一类重大祭典，主祭者必定是王，这是王掌握最高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最后还有军权。如同下文将会看到的，《周礼》作者主张兵农合一，管理百姓的官员同时又是军队的将领。